



佛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

它在诞生后的260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传播到了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甚至在美洲与欧洲也能看到它的存在。

在我国，佛教文化融合了老庄思想和儒家学说，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中。

华严寺作为一个承袭慈山大师法统的临济宗禅寺，对于崂山佛教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今日华严寺，是崂山佛教的象征。

向我们述说着崂山佛教的历史与文化……

崂山佛教

Laoshan Fojiao

潘怡为 著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佛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

它在诞生后的260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传播到了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甚至在美洲与欧洲也能看到它的存在。在我国，佛教文化融合了老庄思想和儒家学说，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深深地植根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中。

华严寺作为一个承袭慈山大师法统的临济宗禅寺，对于崂山佛教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今日华严寺，是崂山佛教的象征，

向我们述说着崂山佛教的历史与文化……

崂山佛教

Laoshan Fojiao

潘怡为 著

青島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新平知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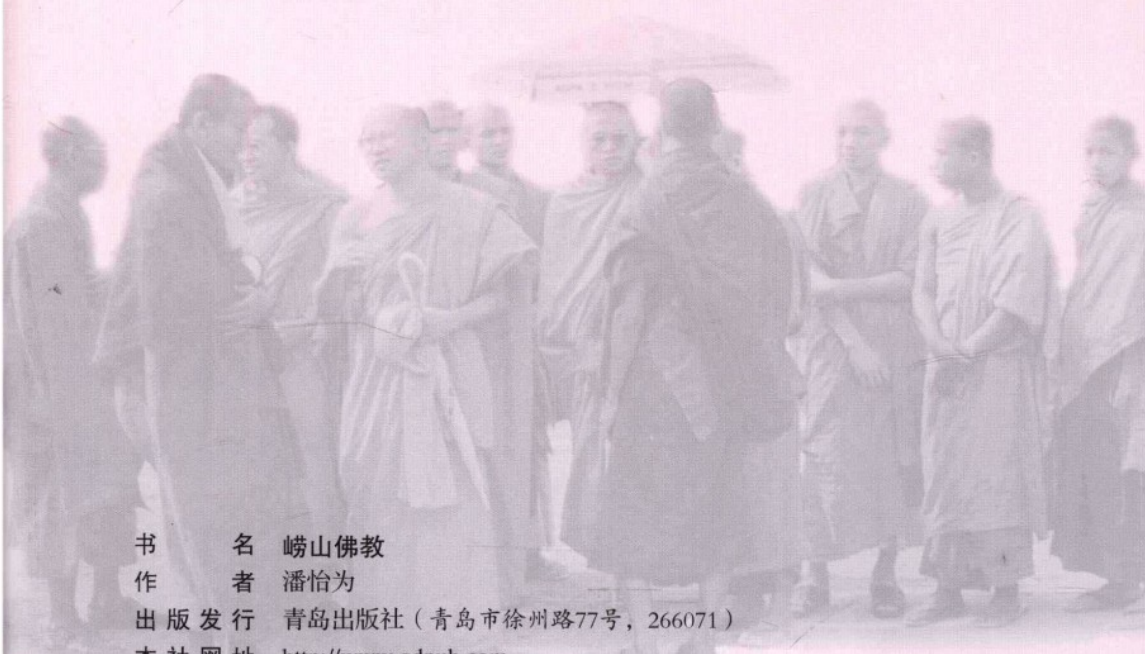
崂山佛教 / 潘怡为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ISBN 978-7-5436-2738-3

I. 崂… II. 潘… III. ① 佛教史—青岛市 ② 佛教—寺庙—简介

IV. B947.25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82187号



书 名 崂山佛教
作 者 潘怡为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青岛市徐州路77号, 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80998664
责任编辑 李忠东 电话 (0532)85816241
设计制作 张伟伟
制 版 青岛人印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海蓝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日期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 (710mm × 1000mm)
印 张 4
字 数 80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2738-3
定 价 12.00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免费服务电话 800918621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

电话 (0532)80998826



作者简介

潘怡为 男，1963年出生于青岛。历史学学士。中国考古学会会员，青岛市收藏与鉴赏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古钱辞典》、《沈从文传》、《老舍评传》等及学术论文数十篇。





序

明哲

佛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它在诞生后的260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传播到中亚、东亚、南亚、东南亚广大地区，甚至在美洲与欧洲也能看到它的存在。在我国，佛教文化融合了老庄思想和儒家学说，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之中。

青岛地区是我国佛教流传较早的地区之一，三国时期崂山已建有佛寺。东晋的法显、明代的憨山德清大师以及现代的倓虚大师、弘一大师、慈舟大师等曾在青岛及崂山留下足迹。天台宗和禅宗等佛教宗派在青岛也多有分布。华严寺作为一个承袭憨山大师法统的临济宗禅寺，对于崂山地区佛教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崂山佛教在地区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佛教文化史上都是不可或缺的篇章。

今天，青岛及崂山地区的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宋元以来少有的蓬勃鼎盛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盛世修史。佛教界应当及时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团结一致，为佛教事业的发展而努力。潘怡为先生著的这本《崂山佛教》反映了佛教和佛教文化在青岛及崂山地区的沿革和发展状况，虽行文简约，但内涵丰富，且图文并茂，对于大家了解青岛及崂山佛教历史文化颇有价值。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者投入佛教研究事业之中，在这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当中多结硕果。

是为序。

目 录

序	明 哲
第一章 佛教简史	[1]
一 佛教的产生与传播/01	
二 佛教的基本教义/04	
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09	
第二章 中国佛教各宗派简介	[20]
一 南北朝佛教——初步繁荣与宗派之萌芽/20	
二 佛教的鼎盛期与各宗派的建立/25	
三 五代十国及宋元明清各代佛教之沿革/35	
第三章 崂山佛教史与华严寺的沿革	[39]
一 崂山佛教简史/39	
二 华严寺的沿革/44	
第四章 今日华严寺	[50]
主要参考文献	[58]



第一章 佛教简史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诞生当然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历史上，佛教传至东亚以后，克服了许多困难，经受了诸多挫折，逐渐成长为一个重要的宗教，与儒教、道教并称为中国的三大宗教。它借助于中国之道家、儒家思想，逐步适应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传统，深入渗透到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佛教文化在其诞生国——印度灭绝之后，在它的传入国——中国却日益发展壮大，成为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崂山自始至终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伴之享尽荣华、历经磨难。

一 佛教的产生与传播

佛并不是神，而是人。他的名字叫“乔达摩·悉达多”（Gautama·Siddhārtha）；因为他属于释迦（Śākya）族，所以人们又称其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他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中叶，约略与中国的孔丘同时代。所谓“佛”，是“佛陀”的简称，是“Buddha”的音译，意为“觉者”或“智者”，有3层含义：一是对于法的性状有觉悟；二是不仅自觉，而且觉他，即使他人觉悟；三是自觉与觉他的功德与智慧都已达到圆满的、至高无上的境地。所以，佛教认为：过去有人成佛，将来也能有人成佛；一切人都有觉悟的可能，因而也都可能成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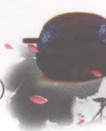
“佛”既是如此，那么“佛教”又当怎样解释呢？从广义上来讲，它是一种宗教，位列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有自己的团体组织、经典、宗教仪式、传统

习惯等等；从狭义上来讲，它仅是佛的言教。如果用佛家术语来解释，那就是“佛法”（Buddha Dharma）。佛教之“法”说的是每件事物都有自己的性质和相状，一切事物在佛教术语中都可以叫作“法”。那么，佛根据自己对于一切法如实的了解而宣示言教，也具有“任性自持、轨生物解”之含义，当然也叫作“法”，这便是“佛法”。

释迦牟尼出生于南亚次大陆北部，位于今尼泊尔国南部的迦比罗卫国。其生卒年月争议颇多，一说为公元前565—前486年。生日为农历四月八日，因而这一天被佛教定为“佛诞节”、“浴佛节”。其父亲是迦比罗卫国的国王，名为“净饭”；母亲名“摩耶”。根据当时的风俗，女人必须回娘家生产，而摩耶夫人正是在回娘家待产的途中，在蓝毗尼花园的一棵树下生下悉达多王子。



四川大足石窟描绘佛祖诞生之“九龙浴太子”塑像



阿育王时期曾在那里建造了一个石柱以志纪念。此后，蓝毗尼花园逐渐荒废，直到公元1897年才由考古学家发现了石柱，并发掘蓝毗尼花园，佛陀诞生地得以重见天日。现在尼泊尔政府已把这里当作佛教圣地加以保护。

释迦牟尼出生后仅7天，他的生母摩耶夫人就去世了，他的姨母波闍波提夫人抚养他长大。幼年的悉达多王子师从婆罗门学者们学习哲学、算学及文学等，学识渊博，还向武士们学习骑术和剑术，文武双全，因而父亲净饭王对他寄予很大希望，打定主意要将王位传授给这位长子，希望他能建立殊勋，成为一个统一天下的“转轮王”。但是，少年悉达多王子却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人，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低种姓的下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以及社会与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让他陷入痛苦的沉思，而他所受到的教育并没有给他以解决这些痛苦的办法，婆罗门经典——《吠陀经》中也找不到答案，他将要继承的王位和随之而来的权力也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据说悉达多王子在14岁那年曾驾车出游，遇见一位离家修道者，对他讲过一些出家修道可摆脱生老病死、尘世烦恼的道理，使他由此而产生了出家的念头。净饭王对此当然百般阻挠，曾试图用物质上和肉体上的享受来控制悉达多，消磨他的意志。在王子16岁时，净饭王为之娶回邻国公主耶输陀罗为妻。不久，公主还为悉达多生下一个儿子。但是，这一切并未使释迦牟尼改变想法，他出家的念头反而愈加强烈，最终在一个深夜逃入森林，净发剃须，抛弃华丽的王子衣裳，换上袈裟，成为一名修道者。关于他这时的年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为29岁；另一种说法则仅为19岁。

释迦牟尼出家后，曾寻访几位著名学者，但都满足不了他思想上的要求，于是便遁入林中苦修达6年之久，备尝艰辛，苦思冥想，却徒劳无获。于是，他离开苦修之所，在一条名为“尼连禅河”的河水中洗尽6年之污垢，然后接受了一位放牧女子提供的乳糜，逐渐恢复了体力。他又来到一棵毕钵罗树下，发誓道：“我今如不证到无上大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他继续苦思数日，最终在一天夜里彻底觉悟成佛。那棵树和所有同样的树也更名为“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

释迦牟尼的学说由于深得痛恨种姓制度的下层民众以及不满于婆罗门教势力的新兴贵族的欢迎，所以发展得非常迅速。释迦牟尼的弟子中既有乞丐、妓

女，也有贵族与富商，他的第一个女弟子正是将幼年的释迦牟尼抚养长大的姨母波阇波提夫人，此外还有一些国王和官僚。到释迦牟尼涅槃时，佛教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而且在释迦牟尼之后的百余年，佛教团体内部没有发生分裂。这也就是佛教历史上的“原始佛教”时期。此后，佛教分成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到释迦牟尼逝世后约400年，上座、大众2部又分成了18~20部。

公元前3世纪，摩揭陀国国王阿育王南征北战，实现了全印度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在战争中，他认识到仅靠武力征服人们的肉体是不够的，还要征服人的精神，于是便利用佛教作为他的政治和思想武器。他大力传播佛教，专门设置了主管全国宗教的官职——“正法大官”。在此之前，佛教的传播仅限于恒

河流域，而阿育王时期及其身后一段时期，佛教不仅传遍全印度，而且远播东亚、北非和希腊，成为世界性宗教。

二 佛教的基本教义

佛祖释迦牟尼出家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寻求解脱生老病死、弱肉强食等“世间之苦”的方法，因而佛教的原始教义简单地说来，就是解脱痛苦之道，即所谓“四谛说”。四谛说讲的是世间的苦、苦的原因、苦的消灭和灭苦的方法，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佛教之苦说的是社会人生“一切皆苦”，有“八苦”之说，即生、老、病、死、怨憎会（即与憎恨的人或事物相遇）、爱离别（即与所爱的人或事物相别离）、求不得（即追求的人或事物而得不到）、五蕴盛（即人体本身就是痛



阿育王石柱



苦)。佛教认为痛苦的根源在于“无明”，即愚昧，应当消灭痛苦的原因，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进入最高的涅槃境界。“四谛说”所依据的原理是缘起论，佛教所有的理论、典籍都以此为基础。“缘起”即“诸法由因缘而起”，因、缘就是关系和条件，一切事物和一切现象都是相对的互存关系和条件，离开了关系与条件，任何事物都不能生成。互存关系又可分为同时的互存关系和异时的互存关系。像师生关系就属于同时的互存关系，没有老师就没有学生，没有学生也不成其老师，这很容易理解。异时的互存关系则像是种子与秧苗的关系：过去先有了种子，所以今天有了秧苗，而正因为今天之秧苗，过去的种子才成其为种子。总之，一切现象必然是在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存在的，没有任何现象是可以脱离其他关系的绝对存在。上述互存关系，用一种通俗的说法，就是“因果关系”。借上面的例子来讲，种子是因，秧苗是果，这是异时互存关系；同样，同时互存关系的师生关系也是因果关系：老师是因，学生是果。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有因的，必然受因果规律支配，这就是“有因生义”。原始佛教理论含有许多辩证的观点，似乎很像是无神论，这也是为了与婆罗门教相区别。但是，佛教并没有否定婆罗门教的神，而且有些婆罗门教的神还被收进佛教做护法神。后来佛陀也出现被神化了的事实，但从佛教教义来讲，佛不是造物主，不能主宰吉凶祸福，而且本身也受因果律支配。

佛教的缘起论有11层含义：（1）无作者义；（2）有因生义；（3）离有情义；（4）依他起义；（5）无动作义；（6）性无常义；（7）刹那灭义；（8）因果相续无间断义；（9）



苦行的释迦（印度西客里出土）

种种因果品类别义；（10）因果更互相符顺义；（11）因果决定无杂乱义。上述“十一义”归纳起来，可以形成4个重要论点：（1）无造物主；（2）无我；（3）无常；（4）因果相续。

“无造物主”的意思是：既然“诸法因缘生”，也就“无作者义”，就是不能承认有造物主的存在，也就否定了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无我”的概念与“有情”相对。梵语中“有情”是“satta”，人和其他一切有情感的生物都叫作“有情”。佛教缘起论认为：所谓“有情”，是不同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从身体的组织来说，是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6种元素）构成。依据前五大组成身体的各种机能：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暖气，风为呼息，空为种种空隙；依据最末一大“识”表现出种种的精神活动。从心理角度来讲，“有情”则有“五蕴”之说，即色、受、想、行、识。“蕴”（Khandha）或作“阴”，堆的意思，即把不同的现象分类，每类做一堆，就成了“蕴”。“色”就是各种物质的总称，人的眼、耳、鼻、舌、身五“根”（指人的感官）和色、声、香、味、触五“境”（人的感觉对象）都属“色”；“受”是感受，指在外界作用下所产生的各种感觉；“想”是印象（摄取事物之相貌）；“行”是思维，是推动身心活动的力量；“识”是了别，指对于所认识的对象加以鉴别、判断与推理。佛教据此认为，“有情”是诸多要素的聚合，不存在一种独立的、绝对存在的“有情”支配人的身心，所以就找不到“我”之存在。这也就是“缘起十一义”之“离情有义”、“依他起义”、“无动作义”所说的道理。

所谓“无常”，即“缘起十一义”中之“性无常义”和“刹那灭义”，指天地万物都是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互存关系，没有永恒不变的存在。任何现象都是无常的，表现为刹那生灭的。佛经所言“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即是此意。“诸行”就是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或现象。“行”是不断变化的意思，本身就有无常之意。“生灭”2字，包含着“生、住、异、灭”4层意思：“生”指一个现象的产生；“住”指一个现象产生后起作用的期间；“异”指一个现象在有作用的同时却在变异；“灭”就是指现象的消灭。佛教认为一个物体，乃至一个世界的生住异灭，都是刹那生灭相续的结果，不存在所谓“永恒不



南传佛教僧人（沙弥）



难陀皈依（印度石窟壁画局部）



变”的事物。

“因果相续”即十一义之“因果相续无间断义”、“种种因果品类别义”、“因果更互相符顺义”和“因果决定无杂乱义”，指因缘所生之一切法，既生灭无常，又相续不断，如长河一般前后相续、因果不断。

“十二因缘”是佛教缘起论针对人生问题的理论，它把人生分为彼此相互依存、因果相生的12个环节，包括无明缘、行缘、识缘、名色缘、六入缘、触缘、受缘、爱缘、取缘、有缘、生缘、老死缘。（1）“无明缘”是一切生死痛



苦的本源，是对“无常无我”等佛法的无知。（2）“行”依存于“无明”，是由于无明而导致的各种行为。从佛教术语来讲，是以现在的“果”去看过去造的“业”。（3）“识”是先于形体而存在的精神统一体，它不能离开名色而独立，但识又是名色的核心。识对境（认识对象）有总了别作用，使境增加明显，使根增长功能，使受、想、思有所领导。（4）“名色”即身心的合戒组织。名指心，即精神。色指形体。（5）“六入”又名“六根”或“六处”，指眼、耳、鼻、舌、身、意，是传达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的机能。（6）“触”即接触，是根、境、识三者交合而发生的心理活动的开始，所以它依存于六入。（7）“受”即感觉或感受，是由接触外界事物所引起的快感（乐受）、不快感（苦受）或不苦不乐感（舍受）。（8）“爱”即生命欲，它是生命活动之本源。（9）“取”意为追求执得。追求色、声、香、味、触五欲，执着可爱的事物为己所有。（10）“有”就是存在。佛教认为身口意所造之善业、恶业对招引自己的后果潜伏的一种力量叫“有”。（11）“生”即诞生、生存，与老死相对。没有生则没有死，也没有忧悲苦恼。佛学意义上的生指爱、取、有所产生的果报。（12）“老死”是“生”的终点，又是观察人生的起点。老死忧悲苦恼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佛教以十二因缘为人生12个互为因果、相互联系的环节，借以说明生死缘何无穷无尽，其实也就是“四谛”说中苦谛和集谛的主要内容。

佛教理论的最高境界是“三法印”，它是对上述佛教基本教义的概括。

“印”就是印玺，“法”当然是指佛法。“法印”是指凡符合“三法印”者，方为真正的佛法。“三法印”简言之就是3句话：“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也可以将“有漏皆苦”加入进去，称为“四法印”。“诸行无常”指宇宙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果相续，刹那生灭；“诸法无我”指天地万物都没有主宰，没有一身之内的主宰，也没有宇宙万有的主宰；“涅槃”是佛教认定的“智慧福德圆满成就的，永恒寂静的最安乐的境界”，这种境界“唯圣者所知”，是一切烦恼和苦果苦因、生死轮回的消灭，所以叫作“涅槃寂静”。想达到涅槃的境界是很难的，须以戒、定、慧三学刻苦修炼，其中仅戒律便有250余条（汉传佛教），还有四念住、四正勤、四神足、七觉支、八正道等修行法



门共37道品。经得住所有这些，方有可能达到涅槃。

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是何时传入中国的？对此，历来众说纷纭。传说印度阿育王曾派沙门室利房等18人来中国传教，当时中国是秦王朝统治时期。《史记·始皇本纪》中有“羨门”的记载，疑即沙门。但是，仅凭传说及文献中的孤例，尚不足为证。另外，由于汉武帝极力开拓西域，而中亚细亚当时已是佛教盛行的地区，因而佛教在西汉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可能性也很大。公元前2年，大月氏国国王的使者到长安，口授佛经给一位名“景卢”的博士弟子，这是史书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

对于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这个问题，影响最大、最具权威性的还是东汉明帝“感梦求法”之说。东汉牟融著《理惑论》记载：“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上说中之“张骞”当为班超之误。此外，还传说有西域沙门迦叶摩腾和竺法兰随汉使来华，以白马驮来经书、佛像，明帝因而为之在洛阳建白马寺。上述传说证明，佛教传入中国之发端虽未必起于汉明帝时代，但佛教作为宗教得到中国官方的认可并推行，则始于汉明帝时代无疑。因此，无论是史学界还是佛学界，对此观点均无异议。除上述说法之外，关于佛教传入中国时间的一些传说，如“老子化胡”及孔子“已闻西方有圣焉”之类，皆为附会，不足为信。

大体说来，佛教进入中国的路线有3条：第一条，是由印度经中亚细亚，通过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再经中国大陆传入朝鲜和日本，这是“汉传佛教”所经过的线路；第二条是由印度次大陆穿过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西藏，经中国西北地区进入蒙古高原，这是“藏传佛教”的线路；第三条是由印度经緬



甸、泰国进入我国西南地区，这是“南传佛教”的线路。我们前面所说的大月氏使者口授佛经及汉明帝“感梦求法”等史实都属于第一条路线，因而这条经西域的佛教传播路线是佛教传入中国的主要路线。

除上述3条路线之外，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还有一条，那就是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即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到达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康僧会与菩提达摩来中国传教时，走的就是这条海路。在汉明帝时代，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笃信佛教，而且当时东南沿海及南方地区佛教的传播似乎胜过中原。由此看来，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陆路、海路相加，应共有4条。

佛教传入之初，恰逢中国内地盛行黄老道等神仙方术，佛教也曾被人们误认为是其一种。《后汉书·楚王英传》载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佛祖也被描绘成了一个“蹈火不烧，履刃不伤……欲行则飞”的神人，这与佛教的本义显然是有误差的。针对这种情况，佛经的引入和翻译便显得尤为重要了，东汉明帝时以白马驮到长安的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印度僧人就翻译了一部分佛经，即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到东汉末年，中国内地涌来大批西域的佛教学者，翻译佛经，弘传佛教，安世高是他们当中著名的一位。

安世高原是安息国（今伊朗）王太子。他在老国王病逝后自己即将继承王位的时候，突然感悟，对于王室贵胄为争夺权力而无休止的残酷斗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虚伪与阴险深感厌恶，服孝之后，便将王位让给自己的叔父，出家修佛，从此周游诸国，宣传佛教。汉桓帝的时候，安世高来到中国，在当时的国都洛阳住了20多年，共译佛经30多部，主要有《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道地经》和《人本欲生经》等。

安世高是小乘学派的代表人物，以《阿含经》和“禅数”之学为主。《安般守意经》讲的主要是“数息观”，即“禅数”，就是通过数出入呼吸来静心守意，是“五停心观”之一。在小乘禅法体系中，“五停心观”是整个修习过程之必要的准备阶段，包括应对贪欲的“不净观”、应对嗔恚的“慈愍观”、应对痴愚的“因缘观”和应对心神散乱的“数息观”。所谓“数息”，是指集中注意力来数呼吸的次数，从一数到十，反复不已，以此令心神安定。“数



洛阳白马寺

息”只是第一步。要做到“守意”，除数息外，还须有相随、止、观、还、净等“六事”，“相随”是提将注意力由数息转向气息的出入，即一呼一吸的运行上；“止”是指将注意力由“相随”转入静止不动之鼻尖，心界转入绝对安寂之境界；“观”，即观自身而悟“非常、苦、空、无我”；“还”，即断除对人生的“贪爱”；“净”，即无欲、无烦恼之境界。由此看来，“禅数”之学实际上涵盖了小乘禅法之基本要义。

支娄迦讖是佛教大乘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安世高差不多同时来到中国传道。他原是大月氏国人，汉桓帝末年定居洛阳，致力于佛经的翻译。他共译出佛经14部27卷，主要有《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般舟三昧经》等。《道行般若经》与唐代高僧玄奘译著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四回为同本异译。“般若”梵文作“Prajān”，“智慧”之意，特指佛教之“大智慧”，即能观照万物性空之智慧。《道行般若经》的核心思想是一个“空”字。佛教之“空”并没有否认物质的存在。物质有相状、有功用，但它的相状和功用里面并没有永恒不变地指挥它、控制它的主宰，所以谓之“空”。《般若经》主张破除各种“邪见”，通过“般若”，即观照万物性空之大智慧，感悟佛法之真谛，把握万物之实相，达到超然物我之境界。支娄迦讖是第一位将大乘般若